人類世中的展演能動力

張君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意在闡述一個跨越自然和人文對立的能動力概念。首先,我主張當代的"人類世"問題意識核心在於能動力的危機,並批判地檢視布魯諾·拉圖所說的"能動力分配"議題。其次,我討論生態女性主義范達娜·席娃所彰顯的"自然的創造力",並強調生命多樣性對於資本邏輯的抵抗。接著,我探討凱倫·巴芮德所提出的"能動實在論",尤其是關於異質能動者如何共同運行展演的能動力。最後,我主張在人類世中,展演能動力的開展最終和人類行動者的回應和問責能力息息相關。

一 前言:人類世的能動力危機

從上個世紀晚期至今,很多當代文化理論都在批判主客二元對立,包括文化和自然的二元對立,乃至於偏狹的人類能動力觀點。在這個世紀初,"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成為討論許多問題的新架構。¹ 更重要的是,這個展露的新架構強烈呼應著過去一世紀以來的批判意識,尤其對於單向進步主義、開發至上、帝國主義、殖民擴張、全球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拆解和反省。人類世並不是一個空泛的倫理學姿態,僅僅主張人類要善待地球和其他物種,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雖然這些也很重要。人類世作為一個地質學的階段命名乃是建立在長期的科學研究和資料上,以及由此建立的"科學記憶"(scientific

memory)。² 這個嶄新的地質學概念儘管仍有爭議,卻迅速捕捉了社會文化理論的想像。其中的根本原因或許並不是單純的學術流行,而在於人類危機早已在我們的科學記憶中累積許久;這個危機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人類存在的危機,一方面是人類存在所造成的危機。

儘管有不少學者批判"人類世"一詞所可能隱含的人類傲 慢,但這也是出自類似的問題意識,亦即對人類所為的反省。比 如,艾琳·葵斯特(Eileen Crist)認為,「人類世」的命名和論述始 終不脫人類自我創造的普羅米修斯神話,從而忽略人類群體的內 部差異, 並把人類同質化, 視為一個和自然旗鼓相當的對手。因 此, 葵斯特認為, 人類世的論述挺多只是在籲請人類做一個更好 的管理人, 並未從根本上質疑人類的一致屬性與特權地位, 也未 能確實開啟涵蓋其他地球成員的自由概念。3 這類批評確實值得 警惕。然而,我們也可以說,人類世的概念其實蕴藏了人類存在 的暧昧或歧義性格, 並指向了一個有潛力同時關照異質與同質以 及主動與受動的"歧義的倫理" (an ethics of ambiguity)。正如西 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人類存在始終是曖昧與衝突 的,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既然行動,也是被動,既是自我,也 是他者。4 無論是傑生·摩爾(Jason W Moore)強調資本擴張才是 罪魁禍首的"資本世"(Capitalocene),或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 強調跨界異質連結的"蘇魯世"(Chthulucene), 固然 都有其獨特的洞見,卻也可能在看似較為明確的指涉中失落了 "人類世"所包含的異質詮釋空間。5 換言之,"人類世"的命名 儘管包含了人類同質化和人類中心觀點的陷阱, 但也同時指向了 對人類能動力的批判與拆解。我認為, "人類世"的論述場域可 以理解為這個世紀之交生態危機的意識高點,我們人類與不僅是 人類的異質樣態展露, 而此一危機與展露的核心正在於人類能動 力(human agency)的失控與崩潰。

當代全球社會的危機,包括文化、經濟、政治、生態等,除了都是跨科際的議題之外,還有另一個核心共同點,亦即關於能動力(agency)的批判思考。釐清人類世概念的意義,尤其關於人類可以做什麼,以及人類應該做什麼的問題,當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做什麼"的問題僅限於人類的範圍嗎?把人類行動者之外的存在和自由都視為無作為的惰性物質或背景,早已飽受批判,包括科學科技研究、生態女性主義和新物質女性主義。儘管任何一項批判在走過頭的時候都會引發反向的批判,在辯證的思維運動中不斷商権,乃是當代理論場域的生命力。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在〈人類世時代中的能動力〉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一文中指出一個重要的面 向,當代科學的客觀性已經發生轉變。換言之,我們如今要探究 的人類能動力不僅是關於所謂"事實的建構"或可靠性,更是關 於這些"事實"所意欲紀錄或呈現的"現象"本身。6 而人類, 明白存在於這個亟需解釋的現象當中, 扮演著爭議的角色。此 外,人類本身的生存危機也改變了這個現象的知識性質。拉圖不 諱言指出,以往強調共生、和諧等生態思想的時代已經過了。二 十一世紀初的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再是人類要去跟非人類和諧 共生, 而是人類要如何面對大自然的反撲或"蓋亞的報復", 在 未來可能更艱困的環境中存活下去。7 當然,拉圖的意思並不是說 共生不重要,而在強調人類必須面對自身的困境,亦即人類或許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行動主體,而早已跌落,連是否得以存活下去 都是問題。雖然,人類絕對並非唯一值得守護的物種,甚至正好 相反。但"我們"確實是以(並且僅能以)身為人類的肉身和姿 熊活著、思考著並行動著, 就算是聲稱自己為賽伯格或混合物的 哈洛威也是如此。

拉圖的科技研究一向強調非人類行動者的能動力、在談人類世的危機時,他進一步指出的所有能動者"共同的命運",並

強調超越主客二分架構的能動力分配。我認為這個觀點特別有意義,並最能點出人類世當中的能動力危機。

活在人類世時代的重點在於,所有的能動者都分享了同一份正在轉變大局的命運。此命運,無法用任何和主體性或客觀性相關的舊特質來加以追蹤、紀錄、講述和呈現。而今的任務,關鍵的政治任務,早已不再是"和解"或"結合"自然和社會,相反地,是要分配能動力(to distribute agency),盡可能推到越遠越好,用的方式越是差異化(differentiated)越好——直到我們徹底失去任何涉及客體與主體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這兩個概念已經不再切題,除了一種祖傳的意義。8

我們(不僅人類)活著這個同時受動與能動的地球上,共同乘載著那被我們名為"人類世"時代的、巨變中卻難以逆料的命運。我們人類而今要面對的不再像上個世紀僅是商権"自然"和 "社會"的二元對立,而是更重要的也更迫切的,去理解種種變化的過程和可能性。拉圖論能動力的文章並不是孤立的,而關連到他更全面的人類世思考,而主要仍是從一個科學社會學家的角度去探討能動力的增生和分配。⁹ 拉圖主張,我們(尤其是跨科際的科學家)應該把焦點轉向"變質區"(metamorphic zone),不僅是地質學意義上的,也包括各種不同層次的變質區域或地帶,因為這是所謂主體或客體,或各種異質的能動者得以接觸並進行交換和轉化的所在,也是我們(包含人類及非人類)共同的能動力源頭。¹⁰

變質區的概念彰顯了力量的變化。哈洛威的"接觸區" (contact zone) 有點類似,但更強調異質存在與敘事的產生。上變質區的動態乃是關於一切型態的成型與變化,同時也點出了質和 形的相生共演。所謂的質變與形變, 都是界線形構的持續動態。 變化和能動力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更深刻感受 到主動和受動之間的界線並不是固定,而且從未固定,我們也就 不可能再執著於主客的過時對立。而這正是我們身在人類世時代 中所見證的能動力危機。同時,這也是一個關鍵的揭露過程,揭 露了以往暫定的界線與型態,以及我們的思考及行動慣性中所遮 蔽的形變與質變動態。

然而, 招脫主客對立並不表示人類的卸責, 能動力的危機和 分散也不表示可以輕忽人類行為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如同先前所 強調的,人類世的問題意識指向了人類存在的暧昧處境,我們應 該也需要思考一個同時關照異質與同質以及主動與受動的曖昧倫 理。在以下的討論中,我轉向兩位當代的女性主義思想家,探討 她們如何從各自不同的知識立足點 (epistemic standpoint) 去擴展能 動力的概念。

自然的創造力,以及生命多樣性的自由

印度生態女性主義者和反基因改造運動者范達娜 • 席娃 (Vandana Shiva) 的知識立足點是反殖民與反侵略的。不僅站在全 球南方的立足點,也站在自然對抗資本殖民的立足點。問題當 然在於,"自然"是一個棘手的概念,很多當代文化理論家避之 唯恐不及。不過, 席娃並不談自然是如何被建構或重新發明, 不必然出自某種天真的經驗主義, 而是生態守護的實踐使她選擇 貼近更具體的自然存在物, 尤其是維繫在地文化與生命的穀物種 子,以及活生生的人類存在,比如印度受到自由貿易衝擊而自殺 的成千上萬小農,以及在地抵抗跨國資本、守護森林與水源的婦 女們。在席娃所守護與接觸的生活世界中,文化和自然的交織共

生演化幾乎是不證自明的。席娃的論述與實踐核心是在地日常生活中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的相互支撐。

這樣的知識立足點值得正視。長久以來, 我們習於以歐美大 都會學院知識份子的論述為起點,從而忽略了知識的生成過程, 除了拉圖所強調的實驗室脈絡和連結的多重能動者之外,也必然 包括了人類作為認識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態基礎。其實,很多大 都會中心的學者都在理論上處理過這個重要議題,包括強調生活 再生產過程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以 及本文下一節將討論的物質女性主義(material feminism)。其中, 立足點理論的科技科學研究一向很留心後殖民脈絡的相關研究, 也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共謀有所批判。12 然而, 席娃的生存 與知識立足點不僅是在非中心、全球南方、南亞、前殖民地或第 三世界,無論我們用怎樣的分類架構夫加以定位,更重要的是在 地實踐的日常抵抗。席娃對全球化的批判主要是從在地的生計觀 點出發。她在2016年出版的《誰真的餵養了世界? 農商企業的失 敗和農業生態的許諾》(Who Really Feeds the World?: The Failures of Agribusiness and the Promise of Agroecology) 一書中指出,印度近年 來儘管經濟成長,絕大部分的人民卻變得更窮,全球化讓他們失 去了土地與生計。很多印度人並沒有吃得更多,反而吃得更少, 因此,一般認為經濟發展會增加糧食需要並造成糧食價格上升的 說法實是難以成立的詭辯。13

席娃在印度小農生活處境中所看到的全球化是一場接二連三地掠奪與災難。她在1987年創立組織,名為"九種"(Navdanya的梵文意思是九種種子,象徵在地的九類主要糧食作物),1991年正式註冊為基金會,主要目標是保存種子、協助小農、推動文化及生物多樣性,並倡議種子主權(seed sovereignty)、種子自由(seed freedom)和大地民主(earth freedom),並以在地婦女為運動主體。¹⁴九種基金會2017年的年度報告《希望的種子,恢復力的

種子: 生物多樣性和農業生態學如何诱過培養活碳來提供氣候變 遷的解決之道》(Seeds of Hope, Seeds of Resilience: How Biodiversity and Agroecology Offer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by Growing Living Carbon) 總結了過去三十年的努力成果,並以此回應當前的氣候 危機。基本上,氣候變遷是人為因素對生物多樣性所造成的威 脅。當代氣候危機最大的源頭是化石燃料的生產和消費,及其密 切相關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跨國鉅資公司所製造的化學肥料、 基因改造的穀物,以及與此搭配的高毒性除草劑,都造成了土地 和水源的各種生態循環的斷裂。農業生態學的意義正在於維護在 地動態的生命循環,從內在去修復生態的過程。¹⁵

換言之, 生命的過程本身即是解答。因為, 任何具體的生 命體在其獨特的生態循環中都有內在能力可以對抗惰性物質的 衰退,亦即熵的法則(the law of entropy)。16 生物多樣性乃是創造 與維繫自由能量, 並讓生命能量得以在秩序中持續循環的根本。 "生命"的特殊性正在於內在的持續創造力與修復力,一個可以 自我再生的運作系統。這樣的創造力 (creativity) 因此並不會獨尊 人類的智能和想像力, 而是強調生命有機體本身的內在固有能 力。席娃強烈反對跨國資本對"生命"(即特定基因改造有機 體) 註冊專利的做法。因為, 這種做法不僅竊取了全球南方的原 住民在地知識,同時也侵奪了生命體本身的創造性,是雙重意義 的"生物剽竊"(biopiracy)。¹⁷

對席娃來說, 生命的資本化和商品化不僅造成生態災難, 更 延續了數百年來的歐洲往外擴張的帝國主義殖民史。九種基金所 倡議並力行的"種子自由"運動,因此也可以說是反殖民運動的 另一條戰線。席娃主張,我們應該讓種子自由發展,尊重種子的 發展權以及種子多樣性所維繫的生命智慧。"種子並不是一項發 明",種子是生命的創造力體現和發展。我們該如何看待基因改 造種子所涉及的能動力議題,不僅牽涉到生命倫理,也是一個政

治經濟的議題。當抽象和編碼化的"生命本身"(life itself)成為資本累積的策略時,具象而體現的地方生命體也就淪為資本剝削的素材。正如哈洛威在分析當代科技公司廣告詞時所指出,所謂的"生命本身"往往是一個複雜論述網絡的效應,是科技資本的操控客體。¹⁸ 因此,席娃強調,

除非有一天多樣性成為生產的邏輯,否則多樣性不可 能得到保存。¹⁹

要讓"多樣性成為生產的邏輯",意味著挑戰主流的資本主義效率。根據資本效率的主張,單一作物和工業化的大規模農業可以增加產量,而基因改造的農作物宣稱可以防寒害、蟲害,搭配特殊的除草劑更是所向無敵。然而,這些看似"科學"的論述往往似是而非。基因改造作物實際上可能消滅生物多樣性,而單一作物的代價是生態的失衡,因為一個生態系統的內部成分越複雜也就越趨向動態的均衡。大量使用化肥和基改作物的工業化農業往往宣稱可以養活全世界。但正如席娃所指出的,真正養活我們並可以持續養活我們是活生生的土壤、蜜蜂和蝴蝶、生物多樣性、種子自由、小規模農作和在地化的農業生態。²⁰

工業化農業盛行的單一作物(monoculture)反映出現代文化中對一致性的執迷,大量生產與消費的單一文化(mono-culture)。²¹ 消費者社會中標榜的個體差異和追求就像一塊豔麗的遮羞布,掩蓋了大量生產過程中的種種剝削,尤其對自然(包括人類自然)的壓榨與剝削。而今,多樣性的危機展現在人類生活與地球生命的所有層次上,原本深刻豐富的變化塌陷成為看似多樣其實貧乏的商品選項。

實際上,各地農民所面對的生物多樣性侵蝕,最根本的因素正是原本符合在地生態的生產過程被高度科技但造成斷裂的

生產過程所取代。²² 結合了一致性與效率管理方法論的生物科技非但無助於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反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價值,並在操作上加以破壞。除了毀損生物多樣性,跨國資本主義的農業與種子企業也造成全球的「食物極權主義」。而今,除了稻米、小麥、玉米等大宗糧食作物,大多數人幾乎完全不認識其他的重要穀類。原本豐富的穀物多樣性被宣稱有效率的單一糧食作物取代。"種子自由"和"食物民主"的議題因此是緊密扣連的。這些自由至少包括:

"種子法"(the law of the seed) 必須保護種子的自由和農民的自由,基於以下原則:農夫保存種子的自由、農夫培育新品種的自由、免於私有化和生物剽竊的自由、農夫交換和買賣種子的自由、取得開放來源種子的自由、免於基因污染和基因改造有機體的自由、種子進行再生產的自由。²³

生命樣態與發展的自由孕含了一種抵抗資本的另類自由觀。 而全球化所許諾的「自由」、「民主」與「發展」乃是建立在一個掠奪與侵蝕的基礎。種子對於世世代代務農的人們來說,不僅 是生產的工具與成品,更深繫著社會生活的脈動以及精神生活的 內涵。在特定的生態社群中,種子往往在很多儀式中扮演要角, 實質並象徵地豐富了人們的生命。

但席娃和九種基金會並不是反科學科技的浪漫組織。相反的,組織當中有很多科學家,包括席娃本人。他們並不反科技,而是反對科技對自然的殖民。科技的運用不應該侵奪自然的創造力,而是後者的延伸。席娃強調知識和自然的共生。因此,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不僅適用於所謂的自然,也是人類知識發展的關鍵基礎。

192

知識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of knowledge)意味著 我們承認女人、農民、部落民、公民們持續演化的知識, 這來自於他們的生命經驗,以及他們和大地、地方生態系 統與生物多樣性的親密連結。我們需要承認農業生態學 (agroecology)和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新興科學。表 觀遺傳學的領域告訴我們,以往認為DNA是主控制分子, 並且訊息只是單向地從DNA到RNA的遺傳學中心法則已 經過時了。而基因工程所仰賴的正是這項法則。²⁴

農業生態學和表觀遺傳學的共同特性在於強調環境、社會、 生態等看似外部的因素如何影響生命體的基因表現,從而挑戰 了以往遺傳學的簡化論模型,轉而強調內外交互作用的複雜系 統模型。

從深受跨國資本侵奪與衝擊的全球南方的立足點來說,人類 世的能動力危機是數百年來殖民主義剝削的累積,同時也是涉及 在地生態與文化生死存亡的問題。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當然並不是 同質化的集體,而是建立在持續的階級鬥爭。對於人類來說,倘 若要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現代資本主義邏輯的死胡同,就必須肯 定被剝奪者的能動力和主權,包括地方的人類行動者,以及生態 系統中的非人類能動者,包括種子、土地、水,以及其他生命的 體現存在,乃至於廣義自然存在物的創造力與能動力,並以跨科 系的科學方式去探討不同能動力之間的交互作用。而跨科系的科 學方法本身必然跨越並重建了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界線。

肯認並正視非人類能動者,同時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界 線跨越與重組的意義。倘若行動的主體不再僅是傳統上被標示 為人類者,則界線的跨越和重組並不會單純是人類意志或科技 的展現或福音。正如拉圖援引變質區概念時所強調的,變質區是 關於各種異質能動者相遇、交換與轉化的區域,提醒我們在大地 中早已存在著不間斷的變化,以及其中多重能動力之間的動態關 係。席娃對小農和種子的關懷則把焦點更具體拉到人類食物生產 者诱過栽種和土地產生緊密連結的過程,這些過程中的持續轉化 和發展,所體現的都是生態循環中所蘊含的生命自由能量。席娃 等在地農業生態運動所力行的正是守護這樣的大地自由, 從中抵 抗跨國資本的殖民主義。而人類世的生態危機彰顯了這些在地工 作的重要性。

展演的能動力,以及異質能動者的纏繞

美國物質女性主義者凱倫·巴芮德(Karen Barad)和席娃都對 量子物理學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尤其是巴芮德。巴芮德的理論工 作除了澄清一般科普論述對量子物理學的誤解和浪漫化, 更由此 發展出獨特的能動實在論(agential realism)。巴芮德和席娃都批判 科學的簡化論(scientific reductionism)。25 她們從各自不同的生存 立足點出發, 展露出不同樣貌的能動力思考。

在近年的代表作《半路遇到宇宙:量子物理學以及物質和 意義的纏繞》(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中,巴芮德對於物質的動 態以及能動力的空間提出了新的取向,並從後人類的觀點去闡述 一個展演的能動力概念。26 巴芮德的目的之一在於修正從上個世 紀晚期開始流行的知識建構論的偏誤。極端的建構論往往無法解 釋或乾脆避開物質的相關議題,或是只能把物質括號起來,強調 無法化約到語言。巴芮德肯定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談 性別動態時對於展演性 (performativity) 的強調,但她認為巴特勒 終究未能充分認知到物質的動態, 並過於侷限在人類行動者。 而米歇爾·傅科 (Michel Foucault) 儘管在談權力運作和生命科技

時把身體放在核心,強調生物和歷史之間的交織,但仍未能充分闡述身體的歷史性,因此也未能說明身體的物質性如何主動參與了權力的運作。更重要的是,對於巴芮德來說,身體並不限於人類的身體,而包含所有可能意義的身體。能動實在論的提出正是為了補足上述漏缺,提供一個不分社會或自然,關於各種異質的物質力量如何產生能動力,並共同促成現象展露 (the emergence of phenomena) 的理論。²⁷

權力從來就不是虛無縹緲的,不僅是有特定的物質基礎, 也具有堅實但動態的物質性。巴芮德從量子物理學是奠立者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對測量問題的思考出發,強調"我們是 我們所試圖理解的自然當中的一部份"。²⁸ 這句乍看平淡無奇的 話,對當代科學知識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此一認知,不僅是關 於科學家如何測量對象物,也不僅牽涉到如何釐清主體和客體之 間的關係,或概念、儀器和現象之間的動態扣連的過程,而涉及 現象本身的展露。巴芮德強調,我們所說的現象之所以得以展露 或出現,乃是透過特定而具體的實踐過程,包括人類科學家以及 實驗室或研究場域中的其他所有成分的參與。

現象並不僅是人類實驗室裝置或人類概念的產物。 現象是世界的特定物質展演 (specific material performances of the world)。²⁹

此處是關於物質性和論述性之間的關係。裝置本身即是特定的物質一論述實踐 (specific material-discursive practices)。³⁰ 值得注意的是,巴芮德徹底打破了物質和論述之間的界線,主張論述並不等同於語言,而早已總是物質的,反之亦然。因此,這些實踐不斷在動態中劃定界線,包括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然和文化、物質和論述、物質和意義等界線。

巴芮德和許多當代的物質女性主義者一樣,希望扭轉上個世紀晚期走過頭的語言轉向,尤其是其中對物質過程的輕忽。這些努力呼應了不同科學領域中的物質轉向 (material turn)。³¹ 正如巴芮德所強調的,"自然的自然" (the nature of nature),亦即自然究竟為何,仍是一個正當而重要的問題,並不能輕率歸結到文化相對主義。多重行動者不斷構成複雜的纏繞 (entanglements),以及持續動態的現象展露,乃是關於自然如何可能的探討。巴芮德指出,我們所謂的"自然",當擺脫了物化固著的概念,無非就是知識與存有的纏繞場域。因此,巴芮德提出一個"存有知識論的"架構("onto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也就是能動實在論,結合了傳統分屬不同範疇的"能動力" (agency)和"實在論" (realism)。³² 行動和實在是不可分割的。能動實在論不僅批判呈現或再現邏輯所假定的詞與物的對立,試圖超越實在論和建構論之間長久以來的無謂爭論,更要對抗虛無的價值相對主義。行動和實在,主體和世界,乃是在過程中的纏繞。

因此,巴芮德主張以"展演"一詞來替代"呈現"或"代表"(representation)或傳統的呈現邏輯。³³ 但她所說的展演並不限於巴特勒對人類行動和論述的探討。展演,並不僅限於人類的行動者,而必須包括非人類和其他物質能動者。不過,在此必須指出,巴特勒的展演並不限於人類行動者,而把探討擴展到論述場域中的歷史力量。³⁴ 巴芮德認為,巴特勒談物質性的最大缺憾在於她的關懷仍限於人類身體的生產。³⁵ 她批判一般常見的後現代或後結構理論忽略了物質性本身的生產力和動能,從而強化物質等於惰性的偏見。³⁶ 為了強調纏繞與關係,巴芮德主張能動力乃是關於異質能動者的內在行動或內動(intra-acting),而非假想中許多獨立單位之間的互動(interaction)。而她之所以強調「內在」,正是因為認知到這些異質力量之間總是早已交纏扣連。和

巴特勒一樣,巴芮德強調能動力並非主體或客體的屬性,而是反

覆的行動與展演。37

要理解展演的能動力,首先,我們必須擺脫一般對於巴特勒展演論的意志論誤解。所謂的展演性,並不是關於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了,而在於"做"本身。在不斷的動作中,就產生了作用,無論做出相關動作的能動者有沒有意圖或意識。巴特勒在談性別及論述的展演時,就已經非常強調這點。³⁸ 巴芮德把展演能動力的概念擴展到非人能動者,並強調不同能動力來源總是早已纏繞或在關係叢聚中。比如,當遺傳學家把特定的非人能動力命名為"基因印記"(genetic impriting),並不是單純的描述,而是參與在更複雜的展演動態中。一個重要的科學事實在於,科學家們並不完全瞭解那被命名為「基因印記」的非人能動力的運作機制。³⁹ 科學、政治、倫理始終是緊密相關的。

或者有人會質疑,這些看似較為抽象的概念闡述是否也有 助於我們理解人類世的危機? 實際上, 巴芮德討論了很多物理 學測量的例子, 說明在特定的科學實踐中所涉及的物質一論述 實踐。當代科學所探索的許多知識對象都是在這些測量過程中 展露出來的現象。她呼應哈洛威所採用的"衍射"(diffraction)光 學比喻,進一步加以闡述,並提出一個衍射的方法論(diffractive methodology)。40 正如巴芮德所言, 衍射, 或譯為散射與繞射, 是一種常見的波動干擾 (interference) 現象。有趣的是, 這種衍射 或干擾的現象只會發生在波的運動上, 而不會發生在粒子的運 動。41 許多物質都在某些實驗環境中以波浪的方式運動,在其 他實驗環境中以粒子的方式運動。波浪和粒子的兩難不僅牽涉 到測量的環境,很可能也透露了關於「自然的性質」。這些情況 彰顯了能動和實在的動態關係。物理學所探究的身體和現象乃是 在多重力量共同運作的展演能動力中得以展露。因此,巴芮德認 為,比起傳統的反思,從衍射的隱喻出發而建立的方法論更能探() 究觀念和物質之間的纏繞, 乃至於知識、存有和倫理學的不可分 割。42 比如,巴芮德經常提醒我們,量子物理學和原子彈之間的

親密關係,以及二十世紀中第二次大戰結束前的核爆事件的深遠 影響。「理論和炸彈乃是在物質上相互棲居並協助共構的」。⁴³

能動實在論和展演能動力都是關於各種能動者在共同運作中的變動與轉化,包括人類和非人類、物質和論述、自然和人文等界線。各種異質力量的不斷展演,對於巴芮德來說,正是世界本身持續的展出。更重要的是,在展演中持續差異化,形構更具體的存在或類別。但這些過程從來就不會是目的論的,也不會是完全僵固的,而總是暫定的,正如同生命演化的過程中充滿了很多條件和變動,但總是帶有某種不可預測性。

我認為,巴芮德的理論最有意義的地方在於人類責任和後人類能動力之間的辯證關係。在後人類的展演概念和知識存有論架構中,人類的行動和選擇所具有的倫理意義及政治重量反而會被凸顯出來。因為,倘若我們體認到,在所有行動中都包含著和其他異質力量或存在的纏繞與關係,並從而發展出更具生態連結的意識,就必須對於我們身為人類的行動和選擇負起更大的責任。因此,巴芮德主張,能動力不僅是關於開啟更大的可能性,也是關於責任 (responsibility) 和問責 (accountability)。⁴⁴ 對於當代人類世中的能動力危機來說,這或許是最關鍵的議題。

四 代結語: 面對我們的生態存在主義命運

無論是拉圖所強調的變質區,各種異質能動者進行接觸、交換和轉化的區域或地帶,我們共同的能動力源頭,或席娃所強調的自然的創造力,包括種子和人類在內的各種具體生命體的內在力量,以及生態循環中所蘊含的生命自由能量,或巴芮德所闡述的能動實在論、異質多重的展演能動力,乃至於纏繞與關係中的問責,都以其獨特的軌跡回應了當代人類世的關鍵提問。

亦即,"人類可以做什麼?"以及"人類應該做什麼?"的問題 意識。更重要的是,在人類去做的同時,必須認知到人類並非單 一的行動者,而與其他非人類的能動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人類可以和應該做什麼的相關問題也就變得更加複雜。

首先,人類作為行動主體並非同質性的,而有著許多內部 的矛盾與鬥爭, 正如席娃的生態抵抗所指出的, 以及許多不滿人 類世一詞所可能包含的人類中心主義姿態的學者所強調的。反殖 民的運動和反資本的抵抗,在當代國際社會中展現出非常複雜的 關係。比如,在2015年年底在巴黎舉行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 化大會"協商過程中,印度和中國被視為兩大阳礙。歐美等已開 發國家在使用石化能源一個半世紀,造成環境巨大的破壞之後, 轉而要求其他較晚開發國家必須開始朝向綠色能源發展, 甚至責 借這些國家是環境破壞的元凶,卻對自身數百年來對全球多樣化 生態的傷害沒有提出反省, 豈非形同另一種帝國主義的延續。而 在巴黎氣候協定順利簽署之後,2017年甫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卻 宣佈退出,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可以說是一則反諷 寓言。再生能源真的比較"貴"嗎?什麼是"貴",什麼是"便 宜",哪些人或什麼存在被計算在內,哪些又不被計算在內,本 身都已經是充滿生態思考和政治鬥爭的議題。在我們思考人類能 動力時,國家也是一個過大又過小的單位,橫切過國界的階級差 異和在地實踐始終是抵抗資本殖民的最重要改變力量。

其次,人類行動者,無論是資本家或跨國公司,或抵抗資本和反殖民的小農運動者和種子保存者,從來就不僅是以「人類」的姿態單獨行動的。人類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和儀器、概念、典範等種種論述一物質過程一起行動,資本和公司總是夾帶著科學科技的龐大異質能動力組合而壯大,小農的勞動發生在當地生態中,尤其和土地進行動態的交換過程,和種子及其他自然能動力共同行動,一起共生演化。用巴芮德看似繞口的詞彙來說,我

們始終都在各種不同樣貌或配置的纏繞與關係中,我們就是這些纏繞與關係。我們在動態著展演能動力,並從中參與展露的現象,開啟或關閉許多可能性,但我們從來就不只是人類。"我們"這個詞不再只指涉人類。我們包含了人類、動物、種子等其他生命體,也包含了歷史文化沈積中的概念和觀念,包括各種我族中心主義和物種歧視的偏見,也包含了實驗室和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物件。

實際上,"我們"一詞始終充滿鬥爭與爭議的。"我們"的範疇構成本身便是透過多重異質能動力共同展演的政治作為,不僅是關於排除和認同的議題,更重要的是行動的可能性,以及各種意義的責任歸屬和問責性。我們需要一個相當程度掌握人類曖昧處境的倫理學思考,因為,我們不只是人類,但我們仍是人類。更重要的是,在身為人類的內部鬥爭中,階級、種族、性別、地方等壓迫,同時勾連著對於在地生態系統中非人類力量或存在的種種影響。後人類的能動力概念並不是聽天由命的不作為。剛好相反,它召喚著更積極的行動。關鍵的政治及倫理議題因此在於:在承認非人類異質能動力的存在及作用,並認知到密不可分的動態纏繞與關係中,我們要怎麼梳理出人類行動者的責任?

在後人類的人類世時代中,我們所要思考與實踐的歧義或 曖昧倫理已然不同於西蒙波娃在上個世紀中所提出的存在主義 視域。我們身為人類存在者,不僅必須為自身的存在計畫負起責 任,也不僅要在實現自身自由的同時,顧及甚或努力實現其他人 類個體的自由。我們身為人類的同時,也早已經不僅是人類,甚 或不再是人類。我們同時以多樣的模態和可能性存活著,在多樣 異質的共生演化中,也在複雜曖昧的暴力危機中。身為人類的曖 昧性不僅在不斷拆解人類的神話,尤其挑戰各種特權人類群體的 意識形態和統治策略,也必然要在更難以命名的複雜性中重建人 類的實踐空間。在具體的生命實踐中,以及面貌殊異的多重苦難裡,新人類、後人類或非人類的標籤都變得瑣碎。真正重要的,或足以形構物質的(what matters),是怎麼活、怎麼做、怎麼改變的實踐。"看見"的倫理學意義在於,一旦看見了,就是一個在實踐上不可逆的過程。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上,我們已經無法再假裝看不見或感受不到非人類的能動者,以及更多樣生命力的共同展演,也無法再漠視各種異質能動力來源的共生纏繞和相同命運。在當今的行星生態處境中,我們確實依然身為人類,尤其無法逃避人類的歷史責任,但也同時不再僅僅是人類。我們必須擁抱自身不確定但日益迫切的生態存在主義命運。

這些議題將是我們未來要持續去面對的,也唯有實踐才能證明。人類世的能動力危機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和倫理的危機,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而此處的我們將不再只是傳通政治思考中的人類行動者,而包含了更多非人類的生命與存在,以及更開放但也必須慎重的可能性。界線的跨越和質性的改造永遠攜帶著暴力和殖民的隱含危機。我們的倫理學難題同時也是知識論上,以及政治領域的。我們不僅必須在科學的實踐上持續關注並探討共同的能動力源頭,也幾乎不可能再抱持虛幻的價值中立或抽象客觀性,而必須在重要關頭中作出行動的選擇,從而涉入生死存亡的能動力鬥爭。

注釋

- 1 Paul J. Crutzen and Eugene F.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GBP Newsletter* 41 (2000), 17–18.
- Paul N. Edwards,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s for the Anthropocene,"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Vol. 4(1) (2017), 34–43.
- 3 Eileen Crist, "On the Poverty of Our Nomenclatur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l. 3 (2013), 129–147.

- 4 Simone de Beauvoir, *The Ethics of Ambiguity*, trans. B. Frechtman.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76).
- 5 Jason W. Moore, ed.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akland: PM Press, 2016).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6 Bruno Latour,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New Literary History 45(1) (Winter 2014), 1-18, 2.
- Bruno Latour,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5. 7
- 8 Bruno Latour,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15.
- 9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e Regim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 Bruno Latour,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Bruno Latour, Facing 10 Gaia.
- 11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 Sandra Harding, ed.,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echnologies Reader (Durham: 12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3 Vandana Shiva, Who Really Feeds the World?: The Failures of Agribusiness and the Promise of Agroecology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 2016).
- 14 Vandana Shiva, Manifestos on the Future of Food and Seed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7). Vandana Shiva, Earth Democracy: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Peace (Minneapolis: Consortium Book Sales & Dist, 2005).
- Vandana Shiva et al., Seeds of Hope, Seeds of Resilience: How Biodiversity and 15 Agroecology Offer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by Growing Living Carbon (New Delhi: Navdanya/RFSTE, 2017).
- 16 Vandana Shiva, Soil Not Oil: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n Age of Climate Crise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8), 141.
- Vandana Shiv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Boston: South 17 End Press, 1997).
- Donna Haraway,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_Meets_ 18 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34.
- 19 Vandana Shiva, "Biodiversity, Biotechnology and Profits," in *Biodiversity: Social* &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eds. Shiva, Anderson et al (London: Zed Books Ltd, 1991), 48. OF SO
- Vandana Shiva, Who Really Feeds the World? 20
- Vandana Shiva, Monocultures of the Mind: Perspectives on Biodiversity and 21 Biotechnology (London: Zed Books, 1993).

- 22 Vandana Shiva, "Biodiversity, Biotechnology and Profits," 52.
- 23 Vandana Shiva, Manifestos on the Future of Food and Seed, 94-97.
- 24 Vandana Shiva et al., Seeds of Hope, Seeds of Resilience, 35.
- 25 Vandana Shiva, Biopiracy.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8.
- 26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 27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64-66.
- 28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67.
- 29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335.
- 30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335.
- 31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eds., *Material Feminism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42.
- 32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43, 44.
- 33 Karen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3) (2013): 801–831, 811;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30, 89, 90, 134–137, 225.
- 34 Judith 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張君玫, 〈思考歷史能動力: 原住民立足點與批判的展演政治〉,《臺灣社會學刊》61 (2017): 185–221。
- 35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209.
- 36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225.
- 37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214.
- Judith Butler, *Excitable Speech*. Judith Butler, *The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39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219.
- 40 Karen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 41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29, 81.
- 42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29. 張君玫, 《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台北: 群學出版社, 2016), 135–139。
- 43 Karen Barad, "No Small Matter: Mushroom Clouds, Ecologies of Nothingness, and Strange Topologies of SpaceTimeMattering," in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and Monsters of the Anthropocene, eds., Anna Lowenhaupt Tsing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 44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182.